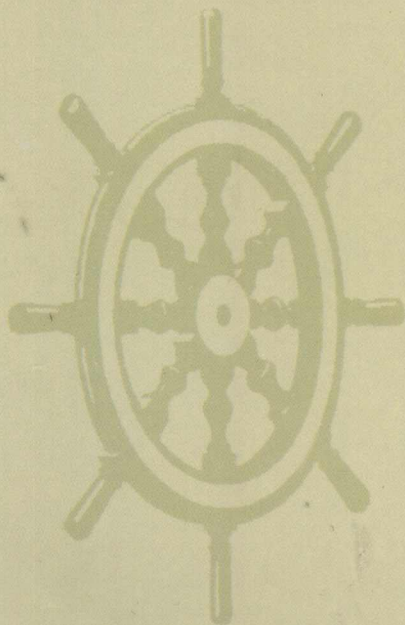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One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g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冯云峰 / 编译

蒙哥马利传

Hundred Biographies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Gigants in the 20th Century

时代文艺出版社

308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威振德寇

——蒙哥马利传

冯云峰 编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漫长的内战	(1)
第二章	从敦刻尔克到开罗	(31)
第三章	哈勒法山之战是一场典型的战斗	(60)
第四章	阿赖曼	(80)
第五章	到达非洲海岸	(117)
第六章	向的黎波里前进	(142)
第七章	马雷斯及其附近的山区	(153)
第八章	从西西里到桑格罗河	(181)
第九章	“霸王”军事行动：总体计划	(211)
第十章	诺曼底：妙计成功	(242)
第十一章	诺曼底：致命的打击	(264)
第十二章	从塞纳河到莱茵河	(288)
第十三章	没有柏林的德国	(308)
第十四章	“是一位获誉过高的将军吗？”	(321)

第一章 漫长的内战

“……从他的社会活动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和个性，他如此专注于政治活动和政府，他的日常生活是如此简单朴素，以致只有在工作中才最令人信服地、最完全地把自己展示出来……如果说为了有助于说明他的行为需要密切注意他的境遇的话，那么，为了不替他辩护，也同样需要更近地关注他的境遇。”

——引自约翰·埃尔曼《小比特传》

“现代观念愈发重视青春期对一个人的性格的影响。约翰·丘吉尔的一生都带有他的青年时期的烙印：那种在彬彬有礼的举止下的顽固的沉默寡言，那种在极其富有的情况下也绝不放松的极端的节俭，那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和不节约的憎恨……。”温斯顿·丘吉尔在描述他的祖先马尔巴勒公爵时是深刻理解他所谈论的事物的，他的这段描述很可能已经为我们分析他的同代人、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的生涯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有一个奇怪的但不一定有意义的事实，在曾经获得了最高荣誉的几位英国统帅中，竟有三个最出类拔萃的统帅——马尔巴勒、威灵顿和蒙哥马利的童年都是不幸的，或者至少是不安定的。这一事实之所以不一定有意义，是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可能充分了解历史上一切伟大统帅幼年生活的确切情况，把他们的军事技能与他们幼年时期的不幸

遭遇联系起来观察。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知道的。马尔巴勒的幼年为难堪的；威灵顿的父亲莫宁顿勋爵在他 12 岁时便死了，他是由冷酷的母亲教养大的。这位母亲对儿子的最后评价是：“他只是一个当炮灰的材料，其他什么也不是。”有关蒙哥马利的材料更多一些，更准确一些，因为他自己曾用异常天真的直率态度回顾了他的成长，以此向世人提供了一份心理学病历。蒙哥马利是理解他的所作所为的，这种理解可能很深刻，也可能很肤浅，但肯定都是他自己意识到的东西。凡是在他的后半生曾经和他交谈过的人都记得，他习惯于回忆童年，回顾家庭关系和他的不幸遭遇，并且念念不忘为他自己提出的“是什么东西使我仍然活着”的问题寻求答案。

蒙哥马利的问题因他的母亲而生。她名叫莫德，是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个名叫法勒的教长的女儿。法勒所写的《埃里克》（或名《一点一点地》）曾是一本畅销书，然而今天已没有人读了；他写的《耶稣传》也曾一度获得成功。莫德在 16 岁时便嫁给了她父亲手下的一个副牧师 34 岁的亨利·蒙哥马利，1881 年，他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了婚礼。未来的陆军元帅诞生于 1887 年 11 月 17 日，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1889 年，蒙哥马利一家离开伦敦到地球上的一个边远地区——塔斯马尼亚。在那里，亨利·蒙哥马利变成了凡迪门地（塔斯马尼亚的旧称）的主教。

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二段中引用了丘吉尔论述马尔巴勒公爵的几句话：“某些人的早年生活处境艰难，因厄运带来的痛苦，与蔑视和嘲笑的刺激，而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天赋的智慧，而没有这些品质，就很难完成伟大的事业。”他继续写道：“的确，可以说，我的童年是不幸的。”他把这种不幸完全归咎于他的母亲；而他的父亲则是他所崇拜的一个文雅的圣贤。尽管如此，他也宽宏大量地承认，他的母亲不得不

用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一大家人的生计。看来，在这个大家庭里，真正缺乏的是爱。在这样一种境况下，如果确实有爱，或者潜伏着，或者暂时没有表现出来，那也许不会引起多大问题；但从蒙哥马利本人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感到爱的缺乏，感到一种持久的折磨……。他的耳际老是响着一句话：“去看看伯纳德在干什么，叫他停下来。”在他的头脑中，这种被剥夺了权利的感觉是尖利的、真实的、不能忘怀的，一直存在到80多岁的时候，他还有这样一种想法：敢不敢去做违禁的事而不被发觉；如果不敢，那就必须接受惩罚。

过多地渲染这类无趣的小事没有意义。但是，蒙哥马利作为军事指挥官所表现出来的许多特点都来源于他童年时期的遭遇。他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人。还在童年的时候，他不仅养成了一种自力更生的习惯，而且有一种“耍花招”的强烈愿望。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分析，那就会发现在他的性格中有这样一种缺憾，这种缺憾是由于他早年挨过饿而产生的，在他结婚以后已经很幸运地得到了弥补。然而，在战争中，这种缺憾还会出现，他习惯于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年青有为的联络军官（即形成一个“家庭”）来弥补心灵上的不足。在他的性格中多少还带有几分受虐狂的情绪：当不端行为被发现时，他总是服服帖帖地接受惩罚。艾伦·布鲁克1939—1940年冬天在法国写过一则日记，记载有蒙哥马利陷入困境并受到批评的事：“我那一天对他所说的一席话，他的反应良好。他感谢我指出了他的错误，并说他很容易做蠢事，希望我今后经常以类似的方式帮助他。我还能再要求他什么呢？”实际上我们还可以更广泛地探索蒙哥马利与艾伦·布鲁克之间的关系。从他们的通信联系中可以看出，艾伦·布鲁克在法国担任蒙哥马利所在的那个军的军长期间，以及后来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期间，蒙哥马利都把布鲁克看成自己的可

靠的保护人，以致几乎可代替他在 1932 年失去的父亲。

另一位著名指挥官（也是一个爱尔兰人）也受过母亲的虐待，这就是 T·E·劳伦斯。劳伦斯在致肖伯纳妻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害怕她知道有关我的感情、信念、或生活方式的任何东西。如果她知道的话，这些东西就会被破坏，被侵犯，就不再是我的了。”劳伦斯把他与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之为“长期内战”。他说了两句带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话：“为了爱而向你的孩子们大声抱怨是不对的。孩子们由于受到年岁和能力这两堵墙壁的阻挡，不能爱他们的双亲。”劳伦斯和蒙哥马利毕生都在仔细分析童年对他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两个人都在有生之年获得了荣誉，并且都为此而扬扬得意……他们总是在弧光灯下后退。这是为什么呢？

约翰·E·麦克教授在《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上撰写过一篇富有洞察力的文章，发表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见解：“他后来写道，当他还是一个学童的时候，他就梦想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他童年时期的读物也多半是些描写中世纪英雄人物的传奇文学。劳伦斯的英雄主义斗争，他对阿拉伯事业的重视，他将一场被围困的斗争转变成为一场光荣的胜利，——这一切在心理学上都可以看成为一种移位，一种恢复失落的自尊心的企图……”，也就是对他童年时代遭到的羞辱进行补偿。

蒙哥马利的情况与劳伦斯的情况不完全一样。例如，对蒙哥马利来说，就不存在他是一个私生子这种模糊的感觉。但是，把他们两人加以比较是有启迪意义的，因为这两位卓有成就的军人的母亲，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都试图在儿子的性格形成时期控制他们。我们还不清楚促使他们追求权力和成就的那些下意识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看来，对自己母亲的不安全感是动力之一，而对蒙哥马利而言，这是他深刻意识到的一种动力。这点是不可忽略的。

从这个痛苦的熔炉中的确炼出了一种性格，其特征之一就是决断能力。蒙哥马利在《通向领导之路》一书中描写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时，他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行动原则下定义：“他无情地除去那些无能的将军，而提拔年轻的军官。他认为才能比资历更可能赢得胜利。他保证他的士兵的士气和忠诚不因装备低劣、饥饿或薪金不足而受到影响。”蒙哥马利在童年时期就养成了独立的观念，这足以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他性格坚强，并且坚持认为：“大多数军事问题都只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蒙哥马利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这是他的才能。我曾经和许多高级军官（他们并非全是蒙哥马利的崇拜者）谈过话，他的战友们反复强调的是：蒙哥马利具有一种特殊才能，他能把深奥的军事问题归结为通俗易懂的基本要点。对一个经常被认为不善于表达自己和质朴无华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本领。如果说简化意味着把混乱的东西变为清晰而全面的话，那么这种简化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本领。蒙哥马利是善于简化的，他童年时期的遭遇无疑有助于他获得这种技能，使他获得自信……而自信则是约翰逊博士所说的“伟大事业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蒙哥马利的出身也给作为军人的他带来了另一种极其珍贵的素质：他是一个爱尔兰人。实际上，蒙哥马利家族是在1066年从诺曼底的法莱斯迁到英国来的（1945年，蒙哥马利在法莱斯隘口的战斗中消灭德国人是很合适的；而在圣福瓦—德蒙哥马利这个法国村庄里，他的对手是隆美尔，后者于1944年7月17日因遭到一架英国战斗机袭击而受伤）。17世纪，蒙哥马利家族在北爱尔兰安家立业。1773年，在伦敦德里经商发财的塞缪尔·蒙哥马利在福伊尔潟湖畔购置了一千英亩土地，并在那里盖了一所叫“新公园”的住宅。蒙哥马利的

生命就从这里开始。他的祖父罗伯特曾到印度追求过功名利禄，在“叛乱”期间当过印度一个省的副总督，并由于工作出色而被封为爵士。蒙哥马利的父亲——未来的塔斯马尼亚大主教，就是在印度的坎普尔诞生的。这位大主教的某次谈论很适用于他的儿子。有一次，他这样说道：“我是在非常艰苦的折磨人的环境里长大的。但总的说来，这种艰苦生活却给了我很大好处。”

然而，蒙哥马利的祖先是爱尔兰人。这就让我们想起了爱尔兰人民对英军历史所作的令人惊奇的、十分突出的贡献。这不仅是几个著名兵团（如康诺特巡逻骑兵团、因尼斯基林团、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北爱尔兰步兵团等）的问题，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家族与爱尔兰有关系的高级军官，在英帝国的正规军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人数很多，这里只要提一下亚历山大、弗伦奇、高夫、艾伦比这样几个名字就够了（更不用说威灵顿了）。在这一系列人物中，蒙哥马利是最可尊敬的后来者。

由来既如上述，为了弄清楚蒙哥马利的精神气质，还必须了解这由来是怎样产生的。

在堪萨斯州的阿比林（一个闭塞的无法无天的小市镇），一位名叫詹姆斯·巴特勒·希科克的绅士被任命为警察局长。据说，他获得这项任命是因为他在被委任之前曾杀死了43人，然后，在任职期间又杀死了57人。1876年，希科克在一次扑克牌赌博后，被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与蒙哥马利同时的伟大人物艾森豪威尔逝世时，阿拉斯泰尔·库克在广播中说：“希科克死后14年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在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诞生。当艾森豪威尔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的一家迁移到了阿比林。”库克提出了一个富有深意的论点：艾森豪威尔是在美国西部极端凶暴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后来成了“一位宽宏大量、性情开朗的军人，一位统率欧美两大洲各色各样人员

的廉洁奉公的领导人”。然而，不应当仅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盟国这两位主要指挥官中，只有艾森豪威尔童年时期曾在边疆生活过。蒙哥马利的童年是在塔斯马尼亚度过的，而塔斯马尼亚的偏僻和艰苦并不亚于堪萨斯的阿比林。塔斯马尼亚这地方是便利的和适宜居住的，但是那些罪犯和被放逐的人至今肯定还鲜明地保留在蒙哥马利的头脑中。他母亲曾经把他归入了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的行列。因此，在塔斯马尼亚，她对蒙哥马利管束得更严了。

1897年蒙哥马利的父亲被召回伦敦参加兰贝斯会议。1901年再次奉召，不过这一次是要他最后返回伦敦，担任福音传播会的主管人。往返旅行对一个少年非常有益，蒙哥马利从这一经历中获得了两种品质，这两种品质终生保留在他身上。一种品质是质朴纯正。那些曾经领教过蒙哥马利所主张的一个指挥官必须带有几分无赖气的理论的人，可能会对蒙哥马利具有天真无邪品质的说法感到惊奇，其实这不足为奇。一个指挥官必须有点无赖气是因为他必须作出决定，而且有时是悲惨的决定。至于这个9岁的小男孩，从刊载在蒙哥马利《回忆录》上的照片来看，他既不是无赖，也不是堕落者，而是一个天真的孩子。蒙哥马利转学到圣保罗学校（1944年，蒙哥马利就在这所学校的校长办公室里制定了进攻诺曼底的计划）后，他的身份是圣徒父亲和别扭的母亲的孩子。当时，他身上除了有天真的品质和讨人喜欢的性格外，还有另外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气质。蒙哥马利在圣保罗学校时是冷酷无情的和不原谅人的，这预示着他的未来。同学们是很实在的，能够说出真实情况，他们对待蒙哥马利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他叫做猴子。圣保罗校刊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要猎取这头动物是很危险的。它会疯狂地直向你冲来，从不犹豫……因此，大家还是不要猎取这只猴子为好。”

蒙哥马利勉强读完了圣保罗学校，又带着同样的精神气质进入桑赫斯特军事学院。他有点儿好吹牛皮，他作为一个学员表现得还算可以，但成绩并不优异，有好几次还由于十足的愚蠢行为而险些被学院开除。接着，他面临着到哪个团队服役的问题。蒙哥马利家没有财产，时髦的兵团（在1914年以前，要加入时髦兵团必须有私人财产）他是不能参加的。他原来希望加入驻印度的军队。但当桑赫斯特学院公布考试结果时，他名列第36位。这个名次太低了，不能保证在驻印度的团队中得到一个位置。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感到非常失望。”没有其它办法，他只好选择皇家沃里克郡团。这是一个正统的团，生活开支不大。他被该团接纳了，而他的加入也的确给该团带来了荣誉，这点已得到了该团的承认。现在他是这个团的名誉上校。1908年12月，他到该团驻印度西北边境白沙瓦的第1营服役。

1914年当这个团作为英国远征军的一部分开赴法国，蒙哥马利给这个团带来了第一个荣誉。那年10月，他的营参与了对德军某阵地的进攻。作为一个青年军官，蒙哥马利身先士卒向一个叫做梅泰朗的小村冲击。在进攻中他发现前面站着一个持枪的德国人。他这样描写道：“千钧一发，必须当机立断。我纵身向那个德国人猛扑过去，用全身的力气猛踢他的下腹部，正好踢中了他的要害。我读过许多关于战争中贵在出其不意的材料，那个德国人无疑感到十分突然，他一定以为这是一种新打法，痛得跌倒在地，成了我有生以来的第一个战俘。”蒙哥马利在圣保罗学校时期的同学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这一天的战斗中，他受了重伤，人们以为他会死去，为他挖好了坟墓。不用说，后来他恢复了健康，而且获得了优异服务勋章。这对一个基层军官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蒙哥马利因那一天他指挥了伊珀尔的第一场战斗而赢得了

这枚勋章。当时他带领他的排，上刺刀冲锋，夺取了梅泰朗村。早在8月25日，即离开英国两天后，他的卓越品质就表现出来了。沃里克郡团在勒卡托投入了战斗，遭到严重损失。在退却过程中，蒙哥马利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返回去帮助抬回了一个受伤的连长。当他返回英国住院时，发现自己已被提升为上尉；后来，当他在1915年1月出院时，发现自己已被任命为旅参谋长（其间仅仅相隔一个月）。那时他才27岁。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用一种容易使人误解的谦虚口气谈论这个问题：“在医院里我有时间进行思考，最后我得出结论，‘笔比剑更有力’这句古训多半是正确的。出院后，我进了参谋部。”这种谦虚之所以容易使人误解，是因为他在《回忆录》的下一页这样写道：“我全面研究了除了我受伤回英国那段时间以外的西线的整个战争。”……可是在这段时间，他帮助训练了新建的一个志愿兵师。

1916年他作为第35师的旅参谋长回到法国前线。其后，他沿着等级制的阶梯稳步上升：1917年担任第33师的二级参谋；同年早些时候担任第9军的二级参谋；1918年担任第47伦敦师的一级参谋。到停战时，伯·劳·蒙哥马利已是中校、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当时他年仅30岁。

停战后，他随莱茵集团军开赴科隆。盖伊·查普曼曾讲述过一个有关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意味深长的故事。查普曼从1915年起就作为燧发枪营的一个军官在西线服役，他是一个真正的经验丰富的军人。他的营当时驻扎在科隆附近，情况很糟。十分无能的营长刚刚离职，老兵们梦想着复员，而年青的新兵则毫无作战经验。查普曼当时是副营长，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鲁莽家伙来接任我们营的营长。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是，他曾经受过伤，是从参谋部来的。不过，他立即就把这个营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

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像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领队。”蒙哥马利亲自负责全部训练工作，搞得很有成效。“可是，”查普曼悲哀地说道，“整整有两个月我不得不在晚餐的时候坐在这个家伙的旁边，不能和他随便说话，因为他只谈军队的事。”

接替他的人很快就到来了。1920年1月，蒙哥马利到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去了。他没有获得参加战后第一期训练班的提名（因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后台靠山的年青军官），而且看来第二期的提名他也错过了。不过，蒙哥马利是一个典型的具有钢铁般意志的人。他既已决定把职业军人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而到参谋学院学习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他就亲自去找驻德国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爵士交涉，并且成功地说服了罗伯逊，罗伯逊帮他获得了到参谋学院学习的名额。

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事并不怎么重要，但这次战争却对他起了很大影响。他是没有经验的青年，有许多军官和他一样年青，一样勇敢，甚至一样能干。但是，一般的好军官，即“仅在作战时才是军人”的那些军官，与坚定地献身于自己职业的重要指挥官是不同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能够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反省和分析，抛弃过时的东西，提出新的建设性的意见。蒙哥马利的大多数同学在1919年都太过于高兴了，他们很快就把过去几年的战争忘掉；而在和平时期的正规军中仍然占据高位的高级军官大多数更是高兴非凡，他们不去思考已发生的事，而热衷于恢复什么“真正的武勇”。于是，在1918年最后胜利的几个月里，曾由黑格洋洋得意地指挥着的那支极其灵活的军队突然变得墨守成规了。

蒙哥马利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还不能十分清楚地了解，他在1939—1945年间付诸实践的那种军事理论，是不是根据他

在1914—1918年战争期间的观察以及事后对经验教训的思考制定出来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种理论的基础和主要前提在他去参谋学院学习时就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以后几乎就没有修改过。那些对蒙哥马利在非洲和欧洲的军事指挥持批评态度的人，轻率地把他说成是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保守将军。这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按其对当时军事机构的态度而言，蒙哥马利在1919年就已经是一个反叛者、一个激进分子、一个不安于己位的人、一个主意很多的人了。艾伦·穆尔黑德写过一本蒙哥马利传，书中描写蒙哥马利在参谋学院学习期间的态度时，对这一点有很好的论述。穆尔黑德写道：“对他以及一些曾经到过法国的有作战经验的年青人来说，参谋学院的课程‘全是胡闹’，是完全过时的不现实的东西。特别是蒙哥马利，学校当局把他看成一个好争吵和好辩论的人，‘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看来他认为自己比教官或其他人都知道得多。训练班为期一年。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们在互相揶揄、嘲笑和争论中度过了这一段日子，最后他们都及格了。”在未来的岁月里，蒙哥马利将是这样品格的人：非正统的，固执的，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强的，有时则是刚愎自用的，但永远也不守旧和固守现状。

蒙哥马利本来很容易变成一个愤世嫉俗者。的确，他对他参加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说过一些、而且还可能再说一些带有很深抱怨的话。直到1969年6月，他在接受一家电台采访时还这样说：“我要说，黑格是完全漠视人的生命的。”我猜想，有两个因素保护了他：坚定不移的宗教信念和对自己职业的完全献身精神。有那么多的事需要做，有那么多的事需要改革，因此他的思想的主流是积极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参谋部工作了几年，才使他没有感染上兵团军人的那种神经病。无论如何，他的精神总算保持了平静和稳定，这在下一次战争中将证

明是不可估量的财富。

由于计划不当而造成惨重伤亡以及由于不必要的伤亡和高级指挥官不亲临前线而造成的士气低落，是 1914 - 1918 年战争对他影响最深的两个方面。他下定决心绝不再使英国士兵遭受另一次帕森达勒的痛苦。在未做好精确计算和周密准备（蒙哥马利认为，应包括情报准备），不能确保胜利的情况下，绝不当发起战斗。凡在非洲和欧洲在他统帅下作过战的军人都认为：蒙哥马利善于驾驭部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士兵们都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绝不会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多次经历过的那样，被派去进行无谓的、准备得很差的冲锋。他们从来也没有感到他们只不过是供屠杀的羔羊。在蒙哥马利的军队中，从来也没有人像过去法国军队在走向凡尔登这个死亡陷阱时那样发出“咩咩”的哀鸣。唯有一次例外，1944 年 4 月，在突尼斯的昂菲达维尔，蒙哥马利十分不必要地把刚从 3200 英里外的伊拉克开来的第 56 师立即派去攻打一个构筑在山中的德军阵地（该处德军刚刚击退了老练的新西兰部队的进攻），结果遭受了不可避免的惨重损失。这次战斗是如此背离蒙哥马利的一般原则，以致于历史学家们至今仍迷惑不解，不能加以解释。实际上，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蒙哥马利直接指挥的军队日渐减少，英联邦提供的归他调遣的步兵数量也不断减少。早在阿莱曼战役的时候，蒙哥马利的作战战术就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诺曼底登陆以后，情况更加严重。第 59 斯塔福德郡师，当时就被解散来增援其它步兵师，而许多野战炮和高射炮炮手则变成了步兵。因此，尽可能少地使用步兵力量，这是任何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的条件，对蒙哥马利来说，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而蒙哥马利正是一个谨慎的人。然而，仅仅说他谨慎是不够的，因为这忽略了他在佛兰德的泥沼中获得的一种纯粹的感情

——同情心。他曾这样说过：“那可怕的伤亡使我震惊。”

蒙哥马利认为，缜密的作战计划只能来源于不断的、全神贯注的和自我克制的检查，不仅要检查战争的原则，而且要检查战争的实践。他这样写道：“1914—1918年战争结束时，我就清楚认识到，军事这一行是一门需要毕生研究的学问。”伴随着献身精神的只能是简朴的生活，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这是一种苦行僧的人生观。希特勒居住在拉斯滕堡的作战司令部里时，他常常躲在一间混凝土的阴暗内室里，静坐在腓特烈大帝的画像下。他可能是在全神贯注地阅读腓特烈大帝的信件，并提醒自己这位英雄怎样从敌人的联合进攻中拯救了普鲁士。但是，希特勒从他的沉思冥想中却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军事才能不会在沙盘模型演习中显示出来，归根结底，它只有在坚持下去的能力中，在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中显示出来。那才是所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蒙哥马利不完全看重这些夸夸其谈的说教，他的优点在于，他一方面不断训练自己“从大处着想”，同时也从不忽视沙盘模型演习。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所指挥的战役总是连最小的细节都预先构想好了。事实上，与希特勒相比，蒙哥马利是腓特烈大帝更为忠实的信徒。蒙哥马利像腓特烈大帝那样，也把中年时光用于坚持不懈的探索、阅读、思考和锻炼，以求精通他的职业，直到细枝末节的各个方面，并使个人的能力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同时，他也是为了提高别人的能力。令人惊奇的是，正是这种强烈的欲望把他这样一个性格孤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卓越的教师。由于他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所以人们都喜欢听他讲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蒙哥马利在教师这个岗位上至少工作了六年。1926年他回到参谋学院当了三年教官（在这时期，艾伦·布鲁克是他的同事，而奥利弗·利斯和约翰·哈丁——这两人后来都在他的领导下升到了很高的军衔——则是

他的学生)。1934年，他又被任命为奎达参谋学院的首席教官。我曾经同这一时期与他共过事的许多军官交谈过，无论是地位与他相当的人还是地位低于他的人，无不热烈称赞（尽管有其他保留意见）蒙哥马利在传授知识和激发学习热情方面的能力。我认为，如果说1939年时英军中受过良好教育的军官远比1914年时多的话，那么蒙哥马利肯定是培养这些军官的最主要的人物之一。艾萨姆准将对蒙哥马利的教学方法感触很深。他说：“蒙哥马利能够极其清晰地说明复杂的情况，并且能够不用一页草稿就总结出一次长时间的演习。他讲话时两眼注视着听众。他具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惊人本领，以及异常明确地指出解决问题方法的才能。要误解他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哪怕他的意思会令人不愉快。在争论中他是难对付的、无情的；他能够像雪貂一样敏捷地识破你的有毛病的推理或半真半假的陈述。”凡是听过蒙哥马利在战争时期所作的著名演讲的人（在肯特的一家电影院中，或是在的黎波里的一家剧院中……没有人吸烟，没有人咳嗽……）都会承认他的陈述异常精采。你可能不同意他的说法，可是，你确实领会了他的意思。

蒙哥马利不只是在教室里才教诲人和追求尽善尽美。他的这两种精神基本上说明了这个性格复杂的人的另外一个奇特的侧面：他对青年军官十分仁慈，既关心教育那些准备寻求知识的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英军中有一种蔑视好学上进的人的倾向），又关心提拔那些显示出有出息、有潜力的人。他的这种特性很快就表现出来。在他1926年去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之前，他曾经担任过两项使他得以发挥这种非凡才能的职务。一次是1923年他到约克郡第49西部骑兵师工作。在那里他不仅主办了每周战术演讲（由他主讲），而且还在晚上辅导年青军官学习。这些有上进心的青年中有弗朗西斯·德·甘冈。后来，德·甘冈成为蒙哥马利的参谋长，参加了蒙哥马利